

中文版序

走近周恩來

一

這是一本我以近20年時間寫出的嘔心瀝血之作。從一開始，我就以中英文同時寫這部傳記。2024年，英文版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現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這個中文版，在問題意識、基本思路和主要觀點、資料搜集和引用以及敘事組織和鋪陳上，同英文版是一脈相通的。考慮到中英文讀者不同的知識背景和閱讀習慣，這個中文版並不簡單地就是英文版的中文翻譯。除了在歷史事件及背景的敘述、檔案文獻的引用，以及中文版展示了一批檔案文件圖片等的區別外，另一個不同之處是中文版加入了這篇序。

這本傳記的英文版出版後，受到國際學術界廣泛關注，在較短時間內就有數十篇書評（包括一些長篇書評）發表。在基本肯定的反響中，意見較集中的一條，是這本傳記沒有一篇跋或結論，給人以一種「故事沒有講完」、意猶未盡的感覺。這一情況的出現有種種原因，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還要從我到美國求學後的一段要緊的經歷說起。1980年代中期我到美國讀博後，正值各種「時髦理論」侵入歷史研究領域之時，也令我在博士論文選題和寫作時頗感困惑。1989年9月，我參加了一個極不尋常、對我來說也極為重要的會議。這次會議由國際冷戰史研究泰斗約翰·劉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教授發起並主持，應邀在會上做報告的都是從中國大陸來美國讀博的研究生，做評論的則是外交史和國際關係研究

領域的世界著名學者。其間，我和在美國外交史領域久負盛名的孔華潤 (Warren Cohen) 教授有一番交談，向他請教「怎麼做歷史」。他的回答是：「這太容易了，講一個好的故事，同時把故事的意義講出來。」這番話竟令我有一種茅塞頓開之感。此後，我寫博士論文就是循着這條走的，越寫越順，居然在幾個月內就完成了論文並通過答辯。此後，這一直是我從事歷史研究及寫作的一條必循「法則」。我寫周恩來傳也是這麼做的，試圖在講述一個關於周恩來的「好故事」的同時，邊敘邊議，把我體察感受到的意義講出來。這樣，寫到傳記結尾時，是否還有必要寫一篇似乎是要為周恩來的人生、政治和外交生涯「蓋棺論定」的「結論」呢？與其如此，是否還不如給讀者留下足夠的空間，由他們得出自己的結論更好？

在中文版基本完稿後，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同仁們又多次向我提出這個問題。當我表示不想逼着自己寫這樣一篇「結論」時，編輯們又提出：「你能否考慮寫一篇具有『實質性內容』的中文版序，和讀者分享你寫這本傳記走過的心路歷程呢？」見我仍在猶豫之中，甘琦社長說，在這篇序裏，能不能就回答兩個問題：為什麼寫這本書？又怎麼寫成了現在的樣子？我被甘琦和她的同事們說服了。於是，就有了這篇既是序、也帶有「導言」用意的文字。

二

我是怎麼會想到要寫一本周恩來傳記的呢？1980、1990年代，我在博士論文基礎上修改撰寫的第一本英文專著是《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中美對抗的形成》(*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The Making of the Sino-American Confrontation*)，不斷地會寫到周恩來。在我的第二本英文專著《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裏，周恩來同毛澤東一道是中心人物。然而，直到2004年，我從未想到要寫一本周恩來傳記。那年，我在弗吉尼亞大學任教。一天，我的同事、在國際學界影響頗大的美國外交史專家梅爾文·萊夫勒 (Melvyn Leffler) 教授把我找去，開門見山就說，他已經同波多馬克出版社 (Potomac Press) 簽約，要編一套關於20世紀世界偉大國務活動家和外交家的叢書，周恩來自然應在其列，這是

一本簡傳 (a short biography)，大約四五萬英文字。他說：你在已出版的兩本著作中對中共革命史、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和外交史都有深入研究，而周是你筆下的重要人物，你寫他應該不難。萊夫勒還誇大其詞地說：以你對中國革命史和外交史的知識為基礎，「這本傳記你大概只要六個星期就可以寫出來」。說完，他哈哈大笑起來。

萊夫勒的這個邀約是我不能拒絕的。在我的學術經歷中，他是我最重要的支持者之一。他讀過我寫的《中國走向朝鮮戰爭之路》後，評價甚高；後來又讀了《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初稿，給我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見。弗吉尼亞大學要招聘一名中美關係研究講席教授時，他竭力鼓勵我應聘，還在同事中大力推介我。當時，我其實並不真正懂得要為周恩來寫傳記（即便只是簡傳）將要跨越的是怎樣一片思想與學術的「汪洋大海」。我當然知道不可能在六週裏就寫出這本傳記，但還是以為，以我當時的學術能力和積累，要完成這本傳記應該不會太困難。我欣然答應了萊夫勒的邀約，並同波多馬克出版社簽訂了先期合同。

若要進一步深究，我接受了萊夫勒的邀約，還有學術上和思想上更深層次的兩個原因。第一，是在我心中（我相信也是我們許多同代人心中）抹不去的「1976年記憶」。那一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在舉國舉世哀悼的同時，卻發生了北京最高層對哀悼「降級處理」的控制和阻礙。這一番操作，把十年文革期間早已累積於普通中國人心中的壓抑和憤怒推到了爆發的臨界點。在我們的心目中，周恩來是「一個有良心的共產黨人」，當時社會上流傳的「政治謠言」，涉及的都是以江青為代表的「反周勢力」的種種醜惡行徑。毛澤東發動文革，曾在億萬人「靈魂深處鬧革命」為號召和目標，但到1976年，卻已在千千萬萬普通人的心目中成為一種地地道道的「異己」存在。清明節來臨，萬千民眾聚集到天安門廣場，在「悼念敬愛的周總理」的旗幟下，抗議的矛頭不僅指向聲名狼藉的「四人幫」，更直指高高在上的「偉大領袖」。「四五運動」——1976年天安門事件——是中國「革命時代」走向終結、後革命時代帷幕拉開的重要轉折點。

時過境遷。在改革開放年代對中國革命時代批判及反思的大背景下，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周恩來在其中（包括文革中）所起作用的各種記錄（包括負面記錄）不斷披露。關於周恩來的評價，一個較大的衝擊發生於2003

年。曾長期在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工作、並任室務委員及周恩來傳記組長的高文謙出版了《晚年周恩來》一書，其中尖銳地提出，周恩來在文革中並非如人們想像的那麼清如冰壺；恰恰相反，他出於「自保」的考慮，在毛發動的文革中扮演了「助桀為虐」的角色。高的這本書幾乎顛覆了周長期以來享有的「天下大亂時的中流砥柱」形象，在中國讀者（尤其是知識階層）中影響極大。這一切，與我和我們這一代人的「1976年記憶」形成了強烈反差，但同時，也激發了我深入探究周恩來人生及政治外交生涯的好奇心。

第二個深層次原因是，全球冷戰結束後，國際學界對於革命、中國革命（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革命）以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國革命主角評價的主流看法發生了極大改變。從學術史（而不僅僅是政治史）發展的視角來看，1989年是20世紀世界歷史一個巨大的轉折點。天安門悲劇的發生，成為全球範圍內大變動時刻到來的前奏。那年初冬，在冷戰期間東西方對峙中成為實體象徵的柏林牆轟然倒塌。之後，幾乎只是歷史意義上的一瞬間，蘇聯和整個蘇聯集團土崩瓦解，曾席卷全球的國際共運退潮，成為一種「20世紀的歷史現象」。於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赫然登上了歷史前台。

所有這一切，促使人們反省歷史，並不可避免地帶來了國際學術界對於「1949年的意義」的再探討，以及對俄國十月革命意義追根究底的重新審視；批判性反思還追溯到200年前的法國大革命（1989年恰好是法國大革命200週年）。「革命」這個曾在20世紀風光無限的詞，開始變得黯淡失色。本來，隨着改革開放宏大歷史進程的前行以及與之相關的重審歷史的推進，學者們已開始對「革命時代」的到來本身以及革命的歷史正當性提出各種質詢。全球冷戰結束後，國際學界對曾在20世紀成為時代主題的危機、戰爭和革命的探討表現出空前的熱情，並朝着否定革命、以「去革命化」為中心關切的方向轉變。在這一背景下，1994年，曾任毛澤東保健醫生的李志綏出版了回憶錄，披露了毛在紅牆背後的諸多「秘辛」；2005年，暢銷書作者張戎和她的丈夫哈利戴（Jon Halliday）合著的《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出版，試圖摧毀毛「獲得正當性的每一根支柱」。這之後，對毛、周以及中國共產黨革命全盤否定的趨勢，又在馮客（Frank Dikötter）

等其他學者的著述中進一步固化，形成了國際學界對中國共產黨革命歷史持否定態度的一股「新主流」。實際上，前文提及的高文謙所著《晚年周恩來》的出版也是同這一變化分不開的。

我自1990年代初開始在美國大學任教，時間正好與上述發展重合。我的博士論文和最初發表的兩本英文專著都以毛澤東和新中國對外政策為研究中心，提出毛從來不把在中國奪取政權當作革命的終點；在他看來，中國革命的最終目標在於徹底改造中國的國家和社會，並在打倒「舊世界」的同時創造出一個將根據革命中國的理念所設計的「新世界」。唯其如此，中國革命的內外使命存在着深刻的內在聯繫：關於中國革命（包括「繼續革命」）勝利及其經驗所起榜樣作用的宣示，為毛在新中國成立之際所作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聲明（從本質上看，這是一項關於「新中國」合法性的聲明）提供了實證上的支持，並轉而成為國內深層次和長時期持續動員（尤其是大躍進和文革那樣的「超常動員」）的最重要源泉。我當時的計劃，是要順着上述思路寫一本關於毛時代中國對外關係的專著的，書名都想好了，是《天下的革命：毛澤東的中國面對世界》。我接受萊夫勒邀約準備寫一本周恩來傳後，在問題意識和基本看法上仍準備循着這條路子走。

三

即使我心裏明白不可能在六週裏就寫出一本周恩來的簡傳，但我動筆後幾乎馬上就感覺到，這是一件遠比我的想像要困難得多的事情。

周恩來自1920年代初投身革命後，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裏一直是深度捲入中國共產黨革命和新中國內外事務的一個中心人物，他的活動涉及面極為廣泛，要寫他的傳記不僅要寫他本人，還要寫到他親身參與或與他有關的方方面面。記得我開始寫這本書時，剛剛從弗吉尼亞大學轉到康奈爾大學任教。當我和同事高家龍（Sherman Cochran）教授講到我準備寫周恩來傳時，他沉思片刻後說：你膽子真大，周恩來的活動遍及中國20世紀歷史的前四分之三，還參與過那麼多重大國際事件，你要寫的不是一部傳記，簡直就是一部20世紀中國史，不好寫！我開始動筆寫書後，就已感到高家龍的話真是一語中的；同時我也覺得，一本幾萬字的小書恐怕只能

講一個簡略的周恩來故事。就在我不知如何應對這種情況時，恰遇波多馬克出版社出問題歇業了。2014年，我與哈佛大學出版社簽訂先期合同，寫一本英文28萬字的周恩來「綜合傳記」(comprehensive biography)。

但對我來說，更具挑戰意味的是，周恩來究竟是怎樣一個人？我應該怎麼寫他？這是很多人向我提出的問題。我還記得，好友許紀霖得知我準備寫周恩來傳時說：周恩來和毛澤東都不好寫，但我看得懂毛澤東，卻看不懂周恩來。又想起，1990年代初我訪談師哲(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等多位中共領導人的首席俄文翻譯)時，曾在他家中住了近三個星期，天天都在談話。他告訴我：一班中共領導人中，最難懂的就是周恩來。

這裏的一個關鍵，在於如何看待周恩來和被林彪稱之為「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毛澤東之間的關係。在學界對周恩來的各種研究和探討中，人們普遍認為，他幾乎一生都處於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in Mao's shadow)，使得他的本相被遮蓋，難以為人們所真切地探知。在議及周時，學者們經常使用的英文詞是enigma或myth，中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個「謎」或「謎團」，「深不可測」。這是因為學者們發現，在可以接觸到的一切文獻和其他資料的基礎上，要走進他的內心世界幾乎是不可能的。

於是，怎樣才能設法走進周恩來的內心世界，成為我寫傳記時遇到的最大挑戰和最大困惑。我清楚地知道，要講一個關於他的好故事，又怎能沒有對於他內心世界的探究？然而，在寫這本傳記的這些年裏，除了他留下日記的很短那一段(1918年)外，我不管做怎樣的嘗試，卻始終找不到進入他內心世界的途徑。曾有朋友向我建議，可以借用行為心理學或心理分析的「科學」方法，來「深入探究」周恩來的行為邏輯和心理狀態及活動。我不想這麼做。且不談這種做法和我對「如何寫歷史」的基本想法不一致，也不是我在學術上之所長。我更擔心，這可能會使我在講述周恩來的故事時，讓自己的主觀故意走到要講述的故事前面，出現「馬車拉馬」的情況，把根本並不屬於周的「東西」強加於他。

我在寫書過程中逐漸認識到，我能做的，恐怕就是不斷地嘗試以各種方法——尤其是在盡可能窮盡可以看到的各種文獻資料(包括回憶錄和口述資料)、並對之甄別研讀的基礎上，憑藉同理心和「移情」方法不斷地

試圖走近周恩來。這並不容易，也是為什麼這本書我會寫了那麼長時間的原因之一。在方法上，我嘗試在敘事過程中常常把自己也放進去，以自己在毛時代生活的經歷和感受為參照，同周的經歷聯繫起來，「重建」他走過的路。

四

很顯然，我能否講述一個關於周恩來的「好故事」，對文獻資料的廣泛收集和深入發掘就成為一個「重中之重」的挑戰。在這一點上，首先我是極為幸運的：我開始寫周恩來傳時，一個從事多語種、多邊檔案研究的「黃金時代」正在到來。

從世界範圍看，美、英等一系列西方國家檔案一直循規開放，學者要使用一般來說不難。隨着全球冷戰結束，從1990年代初中期起，俄國和東歐國家檔案也開始向學者開放，從總的趨勢看，限制越來越少，範圍越來越廣，一扇利用大量俄文檔案文獻研究20世紀中國史（包括中外關係史和中國革命史）的大門被打開了。在中國國內，改革開放的東風也吹進了檔案開放的領域。1987年，全國人大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第一部《檔案法》，確定了檔案定期解密開放的原則。1997年，全國人大又通過經修訂的《檔案法》，進一步拓寬了檔案服務於學術研究的通道。

我在寫作博士論文以及將論文修改為專著的過程中，充分利用了美、英等國的檔案文獻材料；但對中文文獻資料的使用，當時還局限於公開出版或內部發行的各種文件集、決策者的年譜和選集、回憶錄以及訪談記錄等。從1990年代末起，情況開始變化。我仍然清楚地記得，1999年盛夏，我和沈志華、李丹慧一道，在桂林參加了一次關於中國與冷戰的國際學術討論會後，到廣西省和福建省檔案館查閱檔案。我們驚奇地發現，共和國時期（大致到1966年）的大量檔案文獻已解密開放，其中也包括許多當年向下傳達的中央級文獻資料。例如，在福建省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有一份1965年4月12日中央政治局討論備戰和援越抗美問題的記錄。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中國「要後發制人」，「援越抗美」的口號「可以分開兩句說：支援越南，反對美帝」，全國的動員「不要一擁而上」。這段重要史

料，我當即抄錄下來，並在《毛澤東的中國與冷戰》中引用。這之後，我對省、市檔案館解密文獻資料這個「寶庫」格外注意，並盡可能充分利用。

更令我興奮的是，就在我決定要寫周恩來傳的2004年，中國外交部檔案館開始有步驟地解密館藏文件。在近十年的時間裏，檔案分三批開放，力度越來越大。這對於周恩來和中國內外政策研究來說，是又一處極為可貴的寶藏。外交部檔案開放後，我連續幾年利用暑假和其他時間去那裏做檔案研究（有幾次還帶領研究生一起前往）。從2004年到2008年，我代表康奈爾大學冷戰史研究項目，並會同美國威爾遜中心國際冷戰史項目，同外交部檔案館簽訂了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和1955年亞非會議這兩個重大項目上的檔案利用合作議定書（這兩個項目後來都完成了）。2006年，我又作為顧問，直接參與了外交部檔案館和美國國務院歷史辦公室（負責編輯美國外交文件集的機構）在中美關係從緩和走向正常化（1969–1979）這一重大項目上的檔案開放合作議定書（可惜這個項目後來未能進行下去）。我在外交部檔案館的研究工作得到了館方從上到下的大力支持，這對我寫作周恩來傳的幫助極大。

從2000年起，我在華東師範大學多年兼任紫江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導師，同時又先後與沈志華、楊奎松、韓鋼、王海光、李丹慧等一批中國頂尖學者為同事，共同組建了華東師範大學冷戰史研究中心、周邊關係研究院、社會主義歷史與文獻研究院以及當代文獻史料中心，通過同他們的緊密合作以及動員組織研究生參與檔案收集和整理工作，又輔之以同國內外其他學者同行在檔案收集和交換上的合作，使參與各方的學術研究都因此能更好地前行。這些年裏，我一方面把自己收集的解密檔案全部送交華東師大現代文獻史料中心保存；另一方面，我個人的學術研究也從中心保存的大量中、英、俄、日、法等多邊檔案文獻中受益匪淺。

在上述背景下，我在準備撰寫周恩來傳時，已盡可能通過多邊檔案的對比及甄別研究，使自己的歷史敘事建立在更為扎實可靠的基礎之上，並糾正國際學界由於缺少一手資料、或由於對資料的誤讀而產生的敘事或解釋錯誤；同時，檔案文獻也是對於民間一些謠言誤傳最有力的否定。這些年來，我有太多這些方面的經歷和感受，在此謹舉重要的幾例。周恩來在1939年右臂受傷後，由於未得到及時的正確治療造成了終身殘疾，這本是

一樁早已為人熟知的事情。但近一二十年，坊間卻一再出現他受傷是真、殘疾卻為「偽裝」的謠言。俄國解密文件中，有蘇聯醫生為周診斷的詳細報告，以及中共領導人和共產國際關於此事的一系列來往文電，「偽裝」之說為謠言便不攻自破。

1959年3月，在大躍進的嚴重惡果已經暴露出來的情況下，毛澤東在中央會議上聽取工業項目發展過頭的報告後，說「要大減項目」，從1,078個削到500個，並用比擬的方法說「大家吃不飽，大家死，不如死一半，給一半人吃飽」。但在一本關於大饑荒的頗具影響的書中，作者卻把毛的「不如死一半」的話，說成毛指的是人「不如死一半」。這個誤讀太大了！甘肅省檔案館的解密文獻中有這一文件，我把這一段的影印件放到了這本書中。

在文革中，「備戰、備荒、為人民」是一段最著名的毛主席語錄，但根據河北省檔案館的解密文件，這七個字實際上是周恩來根據毛的講話內容總結出來的。不僅如此，周還同時強調，「保備戰」固然重要，但「第一位是農業」，更是要保的重點。在十年動亂中，農村基本未受波及，大饑荒沒有捲土重來，與此是有關係的。

1973年11、12月的「批周風波」，是周恩來晚年政治生涯遇到的一次最大危機。據稱，他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在「中美軍事合作問題」上犯下了「右傾投降」的「賣國罪行」。根據毛指示參加批周的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一次他要被「打倒了」。但周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究竟說了或者做了些什麼，連捲入此事者都講不清楚；而在美方當事人基辛格送給美國國會圖書館和耶魯大學的「全部檔案材料」中，偏偏沒有關於他和周恩來舉行「一對一」會談的任何材料，在基辛格自己的回憶錄中也對此事語焉不詳。美國有一個《信息自由法》，任何人都可以據此要求政府解密並提供「未列為例外」的信息。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這是一個民間機構）資深研究員伯爾（William Burr）有一次根據《信息自由法》要求解密其他信息時，卻意外地收到了周恩來和基辛格「一對一」談話的記錄。我在伯爾的幫助下，在國家安全檔案館獲得了這些記錄。從中可以看到，周並沒有對基辛格所建議的「中美軍事合作」表示同意，更沒有在基辛格帶來的雙方合作諒解備忘錄上簽字，而只是和基辛格約定，雙方將通過特別

約定渠道進一步討論此事。但此後，基辛格再沒有從中方收到關於此事的任何下文。2012年3月，基辛格將他的全部檔案材料送給耶魯大學，我應邀參加了同時舉行的一個閉門學術會議，同基辛格就此事有一番兩個多小時的對話。我根據從中、美兩方看到的材料告訴他，周恩來在他回美後受到了嚴厲批判。每當涉及他同周談判的具體內容時，基辛格卻閃爍其詞，顯然有難言之衷。但由於中方關於周恩來和基辛格談判的文件尚未解密開放，而政治局「批周」會議的記錄又已被銷毀，對這件「謎案」的探討無法再進一步深入下去。

這件事其實也反映出了我在利用檔案文獻寫作周恩來傳時遇到的困局：一方面，很多時候我會覺得可以利用的文獻資料太多了，無法窮盡；但另一方面，更多的時候我仍然面臨着很多關鍵性的文獻資料或者尚未解密開放，或者不知是否存在的困境。這是不願為周恩來傳寫「結論」的又一重要原因。

五

那麼，我又是怎麼會寫成讀者現在看到的這本周傳的呢？我想，最好的回答方式應是和讀者分享我研究周、寫周的過程中走過的心路歷程。我寫周恩來，是從他的童年寫起的。我讀了各種資料後曾有一種強烈的感覺：周恩來後來成為革命者、甚至成為共產黨人，似乎是一個歷史的誤會。周恩來和自幼就表現出叛逆性格的毛澤東全然不同，他曾自承「天性傾向調和」。他在三位女性長輩（嗣母、生母、乳媽）的呵護下長大，從幼年起便開始在嗣母引導下閱讀中國歷史文化典籍。乍一看，這似乎指向了與他後來成為共產主義革命者相反的方向。

但實際上，這裏揭示的正是人生的複雜和不可預測，也說明一個人進入社會後的經歷對他的生活道路選擇的重大影響。在對周恩來早年經歷進一步探討後，我發現，他成為革命者並選擇走上共產主義道路，並不是一種「歷史的誤會」，而恰恰是「歷史使然」。他是在大清甲午戰敗後的1898年（亦即戊戌變法那一年）出生的。他幼年讀書經歷的一個重要結果，是促成了他對於「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中國歷史文化要義發自內心的

接受。12歲走出故鄉淮安後，他看到落後的中國面對西方列強和日本的侵略，正處於一派國難深重的環境與氛圍之中，滋生出「亡國滅種」的危機意識，又從中生發出「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的願景。

當周恩來將這種願景轉變為行動時，何以沒有選擇改良？何以選擇了革命？其實，從一個更為寬廣的視角看，這又成為一個更大的問題：20世紀席卷中國的，為什麼不是改良而是革命？這恐怕還是要從歷史本身的發展中尋求答案。中國開始走入現代，並非自鴉片戰爭始。早在「漫長的18世紀」（從17世紀中葉到19世紀初），域外新農作物的引入和銀銅的大量持續入口，導致了中國農業生產結構性改變以及相應的城市化發展，經濟與社會也開始匯入逐步興起擴展的全球化初潮。大清在鴉片戰爭中完敗後，又有1860年英法聯軍佔領北京，甲午戰爭中慘敗於日本，以及世紀之交八國聯軍佔領京城並被迫支付庚子賠款之類的巨變。與此同時，民生維艱，貪腐遍地，民變不斷，大清已顯示出太多「王朝末期」的症候。即便以中國歷史上王朝興替的週期律來看，19、20世紀之交也到了又一個「改朝換代」的時刻。革命本來就同中國歷史上「造反有理」及「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傳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此時更被越來越多人（尤其是部分知識精英）視為拯救國家、民族乃至中華文明於危難之中的最有效手段。戊戌變法和晚清新政的失敗，更起到了為這種趨勢推波助瀾的作用。這些是周恩來後來選擇走上革命道路的大背景。

惟其如此，我在這本周傳的引言中提出：革命不是原罪。就民心普遍思變的激烈與急迫程度而言，革命在中國的發生和發展曾有過巨大的歷史正當性。這裏的一個基本的意思是，革命之所以會在中國發生，歸根結柢，乃是歷史本身的發展使然；或者說，革命以這樣的規模、烈度、深度和持久的程度席卷中國，並達到那種摧枯拉朽乃至「翻天覆地」的地步，是有其道理的。

從周恩來留下的旅日日記和到歐洲後的書信來看，他從熱血青年轉變為共產主義革命者所走過的心路歷程很能說明問題。這應當歸因於他在新文化運動影響下產生的、欲拯救中國必須「革心」和「革新」的想像願景。他又是一個堅定的愛國者，有着「願中華崛起」的強烈信念。但這兩者在他觀念世界中的結合卻並非通途。儘管他在日本求學期間已接觸到社會

主義思想，五四運動中被捕入獄後，又在難友中講述過馬克思的剩餘價值論，但他初到歐洲求學時，仍表示要「對於一切主義開始推求比較」，以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信仰。之後，正如他在一封信中所述，他在探尋為拯救和改造中國而最適於「應用之於吾民族間者」時，詳盡比較了英國的「保守」之法和俄國的「暴動」之路的長處和短處，得出了中國「積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的看法。這是他信奉共產主義、決心取暴動與革命之途的思想入口。

然而，我在研讀文獻中又注意到，周恩來成為共產黨人後，即便當他為黨具備行動上的效率和戰鬥力、主張必須把中共建設為一個列寧主義黨的同時，他又提出，黨員不能「蠢如鹿豕，只知服從」，而應保持自己的獨立人格，並為自己留下批判思考的空間。這在他的觀念世界中留下了一處「人性關切」和「人道關懷」的禁地，即便在他深度捲入共產黨革命、並成為堅定的共產黨人後，也從未泯滅。

周恩來是在1920年代中期的「大革命」時期從歐洲回到國內的。這也是中國「革命時代」的兩股潮流（國民黨革命和共產黨革命）處於合作狀態的時候。周恩來在中國政治舞台上嶄露頭角，是同他在兩大革命合流的背景下，出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及軍法處長的經歷分不開的。而他之所以會有這一番經歷，又和他與時任黃埔校長的蔣介石之間緊密的工作聯繫以及蔣對他的欣賞有關。此後，隨着國、共兩股革命潮流分道揚鑣，周恩來和蔣介石分屬敵對陣營，但他對蔣是一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的看法卻並沒有全然改變，並始終相信蔣不會「賣國」。

六

周恩來和毛澤東在1926年「三二零事件」後第一次相遇。周、毛兩人在性格、思維方式、處世及待人接物的態度，以及如何「搞革命」的看法等上面，極不相同。周恩來並非沒有思想，但更是一個做實事的人，也從未表現出成為革命最高領導人的意願和決心。毛澤東有梟雄氣質，從來就不是安分守己之人。他從小就同習慣於家中說了算的父親關係緊張，但潛移默化之中已承繼了父親的霸道氣質。他幼年時曾跟着信佛的母親

「拜菩薩」，但成長起來後還是無神論者。然而，他又不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儘管他常常把歷史唯物主義掛在口上，但他的世界觀和思想方式卻受到了唯意志論的深度滲透。他關於革命以及「繼續革命」的言論，尤其是他的一系列關於「理想境界」和「理想社會」的想像，帶有嚴重的唯心指向，強調的是「思想領先」和「意識形態掛帥」。這使得他的「革命」及「繼續革命」的想像和實踐與普通人生活經驗難以契合，而產生「合法性危機」。他自稱身上既有「虎氣」，又有「猴氣」，對此不可小視。如果他僅有其中之一「氣」，就不成其為毛了。在他的政治生涯中，這種「虎氣」和「猴氣」的結合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如果他只有能夠吸引人於一時的烏托邦想像和表述，或只有非凡的權謀，他都不可能在推動革命和「繼續革命」上走得那麼遠。他在實際政治鬥爭的環境裏，在戰略和政策表述與實施的層面，將這兩者結合起來的能力可謂無與倫比。這是他在登上中共最高領導人寶座後，能夠得心應手地駕馭周和其他領導人、使他們幾乎處處服膺於他的底層原因。周恩來與毛多年相處後說過一句體會甚深的話：「毛主席活着，誰也不是對手」，這是一句大實話。

周恩來在同毛的長期相處中也學得了一套因應之道。我認為，那種關於周一直「處於毛的陰影之下」的說法，只是一般性的概括，而不是一種可以涵蓋他們全部關係的「程式」。周、毛兩人在廣州第一次相遇後的五十年間，有近十年時間，周曾是毛的上司，甚至一度還掌握着對毛的生殺大權。直至經過長征之後，毛才成為中共最高領導人，周的首肯和支持起了重要作用。此後直到兩人都於1976年逝世，毛一直是能夠決定周政治生命的最重要之人，而周（尤其是在延安整風後）似乎也一直表現出對毛的思想、戰略、路線和政策全面服膺的態度。但實際上，他們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成不變的；尤其是，從思想觀念來看，周從來沒有成為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也就是說，在他的內心深處，他對毛主義的一些基本教義從來沒有真正信服過）。根據周、毛關係在共事的半個世紀裏的發展變化，我覺得可以分為五個不同的階段：第一段，1927-1935；第二段，1935-1949；第三段，1949-1958；第四段，1958-1971；第五段，1971-1976。

第一階段，從1920年代中期到1935年初遵義會議召開。在這一時期，尤其是在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後，中共轉入地下，周恩

來長期處於中共軍事、組織、情報的領導中樞，實際上是毛澤東的上司。其間，周恩來支持過或保過毛。但他也整過毛澤東，甚至曾是蘇區整毛的始作俑者。他和毛之間的恩恩怨怨，絕不是幾句話講得清楚的，也打下了毛終其一生雖一直用周，卻從未給予周「最終的信任」的根基。

但總的來看，在這一階段，周並沒有用「官大壓一頭」的態度來對待毛，而是始終對毛表現出足夠的尊重。在這背後，我以為周有着一種極富「革命功利主義」意味的考慮。從上海時期到江西時期，處於地下狀態的中共以及在推動「土地革命」的名義下從事武裝鬥爭的紅軍，都是蔣和國民政府眼中的「叛亂勢力」，同國民政府在力量對比上極為懸殊，他們面臨的第一要務是如何生存下去，然後才談得上怎麼「搞革命」。因此，用周自己的話來說，當時在戰場上打勝仗是「決定一切的」。在長征中，當紅軍幾乎被逼到絕境時就更是如此了。在那種條件下，戰場上的一個敗仗就可能使「革命大業」葬送殆盡。周在以往同毛的交往過程中，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毛會打仗，這成為決定他對毛的態度最關鍵的因素。但周恩來從過去與毛「交手過招」的經驗中又知道，毛的野心很大，不好相處，卻仍然在遵義會議上選擇了支持毛重新出山進入最高決策層。之後，他不僅主動將紅軍指揮權拱手交給毛，自己甘願在軍事上做毛的助手，而且還通過只與毛分享破譯的敵軍調動部署情況的電文，製造了「毛澤東用兵真如神」的傳奇，從而加強並鞏固了毛在中共及紅軍領導層的權力和權威。所以，我在傳記中寫道，在毛澤東走向中國共產黨革命中最高領導人的道路上，周是起了最重要作用之人。

七

1935年遵義會議召開後，隨着毛澤東逐步登上中共革命最高領袖的寶座，到1949年革命獲得全國性勝利，周、毛關係也進入了第二階段。這一時期，周、毛共同經歷了長征後半段，攜手合作，成功應對了張國燾「分裂黨和紅軍」的巨大挑戰並幸運地到達陝北。此後，中共和紅軍又因西安事變的意外發生，逃過了蔣介石集中全國軍力對當時已彙集於陝北不毛之地的紅軍各部施以「最後一擊」的危險局面。1937年全國抗戰爆

發後，中共通過同國民黨又一次形成「統一戰線」，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

抗戰伊始，毛澤東就主張，中共必須利用抗戰的時機，在抓住「民族」旗幟的同時，把發展並擴充自身軍事政治實力放在首位。周恩來並非從一開始就支持毛的意見，而是同從莫斯科歸來、對登上中共最高領導人位置「很有想法」的王明一道，主張「抗日第一」、「一切通過統一戰線」。這就造成了他和毛在大戰略和路線上的嚴重分歧，也形成了對毛在長征後期獲得的軍內、黨內最高領袖地位的潛在挑戰。雖然周很快就主動與王明「劃清界線」並逐步接受了毛的主張，但這仍被毛視為他在歷史上的一樁「嚴重錯誤」乃至「罪過」，成了他在毛手裏的一根一輩子都抓住不放的「大辮子」。

在周、毛關係的發展中，延安整風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點。從1938年到1943年，周恩來駐節重慶，負責中共在「大後方」的工作，獨當一面。在紅都延安，毛澤東從1941年起開始發動整風運動，起初並未觸及周，但周其實已是整風的潛在對象。1943年5月共產國際解散後，周被召回延安參加整風。毛要對他做的，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是「一棍子打暈，再用一盆冷水激醒」。從11月下旬到12月上旬，周連續五天在政治局會議上就自己在歷史上的「錯誤」和「罪過」作「深刻檢查」，批他最凶的人中，有一大批中共領導人，尤其是當時在黨的領導層地位躡升的劉少奇（我還記得，有一次我和中央文獻研究室的一位前輩討論延安整風，他說，他讀劉少奇給周肆意上綱上線的會議記錄，覺得簡直不可思議）。最後，還是在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出面干預後，毛順水推舟，讓周「過關」。自此之後，周的工作確實要在毛的巨大陰影下進行，也不斷表現出對毛的思想、路線和戰略的服膺。但這陰影並不只罩住了他一人，也高懸於整個中共領導層之上。

從長遠看，延安整風也標誌着中共革命進入了新階段。中共在「統一思想」和「擺平山頭」的旗幟下，形成了一套以毛澤東的領導權力為核心崇拜的「黨文化」，並將大政方針的最後決定權和革命「合法性敘述」的最終界定權力都交到了毛一人之手，卻沒有在機制層面留下對之加以制約的任何設計。革命以「毛崇拜」為起點，不斷地變成一個巨大和無所不包的

組織和思想的牢籠，在思想、精神乃至心靈上使革命的參與者（包括周恩來）成為革命的囚徒。由此而產生的，是人性的扭曲異化同領袖被神化結合在一起，使得革命開始走上歧途——走向其聲稱要追求的「人的解放」初衷的反面。

然而，若從中共與蔣和國民黨相爭「打天下」的視角來看，延安整風對毛和中共來說是一次極大的成功。1946年至1949年，國共爆發全面內戰，這也是對毛澤東的領導能力、毛思想的正確性以及毛領導體制有效性的一個重大考驗。結果，短短三年間，毛澤東和中共居然在一場乍看上去「敵甚強、我甚弱」、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對抗中，以一種近乎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徹底打敗了蔣介石和國民黨。這也是毛、周合作最親密無間的時期。整個內戰期間，周恩來始終同毛在一道，以軍委總參謀長之身，協助毛指揮協調中共部隊的軍事行動；在他的策劃佈置下，中共情報網絡滲透進入了國民黨方面的各個層級。更要緊的是，毛、周抓住蔣「民主無量、獨裁無膽」的「兩頭都不靠」的弱點，把「反獨裁」和「爭民主」的口號叫得震天響，逼使蔣和國民政府在政治、軍事、社會動員、宣傳等所有領域都失去主動，最後一敗塗地。延安整風後，周恩來在中共領導層的地位和在黨內的影響力一度削弱了，但由於他在內戰中與毛的合作和所起的作用，又重新得到了加強。在人類歷史上，任何「造神」的行為都需要「奇跡」的配合。中共在這麼短的時間裏在內戰獲得全勝，幾乎就是一種奇跡，這對於毛進一步被「神化」、毛思想和毛體制的權威和毛本人日益不受制約的權力的確立，其影響不論如何估計都不為過。

八

1949年，中國共產黨革命獲得全國性勝利，中華人民共和國——「新中國」誕生。然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並不是革命的終結，而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這個話，讀者應該是熟悉的。我對此的解讀是：他想像中的「革命」不僅要將中國人改變為「新人」，將中國改造為擁有普遍正義與平等的新型社會和國家，也要通過樹立中國革命（包括「繼續革命」）的經驗為世界其他「被壓迫民族」的榜樣，開創一個中國在其中佔據中心

地位的「新世界」。正是以這樣的想像為底蘊，他向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關於「新中國」使命的「合法性宣示」，也已透露出毛為他的「革命後的革命」或「繼續革命」創造內在動力的深遠意向。周恩來也說過要「將革命進行到底」，但他的想像和毛並不相同。從這一刻起，到九年後周恩來在「反冒進」上受到毛澤東的嚴厲批判，毛為國家主席，周任政府總理（還兼任外交部長），兩人關係進入了發展的第三階段。

關於建設「新中國」的設想，中共領導人最初的共識是要先搞新民主主義，再接着搞社會主義。周恩來在他負責起草的新政協《共同綱領》中提出了兩個重要意見。第一，新中國要建立的，是以包括中共和各民主黨派的「廣泛的人民民主統一戰線」為基礎的「民主聯合政府」，它「既不是一個階級專政，也不是一黨獨佔政府」。第二，新中國是「根據自願與民主的原則組成」的「中華各民族聯邦」。毛澤東對《共同綱領》做最後修訂時，把這兩項都刪去了。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似乎沒有對此提出異議（但在組建新中國首屆內閣時，周仍希望讓其表現出「聯合政府」的氣象：除總理由周恩來擔任外，四位副總理中有兩位非中共黨員的「民主人士」；15名政務委員中，又有9位由非中共人士擔任）。當我在文獻中發現這些不曾引起研究者重視的重要細節時，心中震動不小。不由得想到，如果周的想法付諸實施的話，那麼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是否會有很大的不同呢？

共和國成立不過一年，就發生了出兵入朝參戰這件大事。朝鮮戰爭爆發後，毛從一開始就力主出兵（美軍仁川登陸前是入朝助戰，之後是出兵援朝，甚至要「爭取全勝」）。我在本書中根據自己的研究提出，他的動機除了保衛東北邊境等安全利益上的考慮，還有推動「革命後革命」的深層次原因。他希望看到的是，通過高舉愛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旗幟，將朝鮮危機帶來的挑戰和威脅轉變為中共在國內實行廣泛政治動員和社會整合的動力，從根本上加強中國人對新政權以及毛本人和中共宏大的政治和社會改造計劃的內在支持與認同。周恩來是中共領導人中較早支持毛出兵動議的人（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中共領導人中最初支持出兵的只有「一個半人，我一個，恩來半個」），但他也為通過外交途徑阻止美軍和聯合國軍逼近中朝邊境做出過最大的努力。

中國參戰付出了極為沉重的代價，但也把戰線從鴨綠江邊推回到三八線附近，從而使毛和中共領導人能夠在國內外宣佈，抗美援朝取得了「偉大的勝利」。從中共領導人的角度看，更要緊的是，中國入朝參戰的經歷和結果大大加強中共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威信和對中國社會的進一步控制，也加強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對毛來說，他也因此獲得了加快「繼續革命」腳步的「政治資本」。朝鮮戰爭還沒有結束，毛澤東的大動作就來了。周恩來於1952年9月訪蘇，獲得了斯大林將為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實行提供全方位援助的保證。毛聽取周在政治局的彙報後立即提出，要腰斬新民主主義，將立國之初決定的「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準備」，改為從即時起「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的過渡」。中共建政後，這是毛第一次在推進「繼續革命」上露出如此鋒芒。劉少奇、周恩來等其他中共領導人因與毛想法不一，反應遲緩。頗受毛信任的高崗摸準了毛的思路，大力推進此事，並向身為二把手的劉少奇開火，結果反而因行事莽撞、在黨內高層散佈了毛的「私房話」，暴露了毛的真實意圖，使毛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局。在處理高崗事件時，周恩來站出來為毛「脫困」，最後毛通過同劉、周的一場實際上的「交易」——毛放棄高崗、劉少奇拋出饒漱石、周恩來被迫犧牲潘漢年——既使得他自己「脫困」，也使得他在十到十五年內完成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在黨內佔據了主導地位。

1956年，在20世紀中外歷史發展中是極重要的一年。國際上，赫魯曉夫和蘇共搞「非斯大林化」，促發了波蘭局勢動蕩和匈牙利的「反革命叛亂」。中國國內，中共八大修改黨章，拿掉了關於「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的提法；八大政治報告提出，在生產資料私有制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國內主要矛盾已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綜合現有資料來看，毛澤東對這一提法並不滿意，但因為一時拿不出一個替代性的提法，沒有直接發難。

這一年的另一件大事，是毛、周在「建設新中國之路怎麼走」這個大問題上的分歧，在周堅持在經濟建設中「反冒進」時露了頭。1955年到1956年，根據毛的「社會主義建設過渡時期總路線」，中共在農村全面推動農業集體化，在城市大搞對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生產經濟領域也出現了「社會主義建設新高潮」。毛開始要求擴大和加快工業化的規模和速度，

擴大和加快科學、文化、教育、衛生等各項事業的規模和速度。然而，周恩來卻發現中國的經濟因投資比例過高、發展速度過快，導致了資源浪費和緊張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失調，他因而提出，必須把「反對急躁冒進」提上日程，並採取措施解決由「冒進」而帶來的各種問題。毛澤東對此不以為然。在5月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還因反對毛追加當年基建投資的主張，罕見地和毛澤東發生爭執，並說：「作為總理，我從良心上不允許我不反冒進。」毛聽到後「非常生氣」，但並沒有與周發生正面衝突，而是轉身就離開了會場。這為毛後來疾言厲色地對周開刀，大批「反冒進」留下了伏筆。

毛和劉、周等其他中共領導人還在應從波、匈事件中汲取何種經驗及教訓上存在分歧。在事件發生後召開的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說：波匈事件的重要教訓是，「重工投資過多，沒重視輕、農，人民生活沒有改善，領導人特權，人民生活苦，群眾不滿走上馬路」。周恩來則強調，除了要反對「對外的大國主義」，還要堅決反對「對內的大民族主義，對人民的專制主義」（這是否意味着周沒有放棄他在《共同綱領》中的想法）。他還強調，搞社會主義不能「忽視了人民的當前利益。直接與人民利益關係最大的是輕工業、農業，輕視這兩者就會帶來不好的後果」。毛的看法和他們不一樣。他注意到的，是匈牙利事件中有一個主要由知識分子組成的裴多菲俱樂部的活動。後來，時勢轉變後，他點了裴多菲俱樂部的名，說它是煽風點火、大搞反革命顛覆活動及資本主義復辟的急先鋒。

自1949年中共建政後，毛澤東就一直有一種揮之不去的「後革命焦慮」。他作為充滿想像力的革命政治家的直覺告訴他，他的思想和黨內其他領導人（不僅僅是同周）有很大的差異；他也極為擔心，他所希望推動的「革命」和「繼續革命」會失去內在動力。怎樣才能把「革命後的革命」推向前進？1957年春天，毛先是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大力推動給中共「整風」的運動，並歡迎和鼓勵黨外人士參加。但結果，這卻演變為一場「引蛇出洞」的「陽謀」大劇，轉變為一場聲勢浩大、充滿火藥味的「反右」運動，在知識分子中挖出了幾十萬「右派」。

我在研究文獻資料中有一個重要發現：在「反右」已開始時，周恩來和毛澤東發生了一番「話語對峙」。1957年7月，毛在那篇號召全面反擊「右

派進攻」的〈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文章中講到民主集中制時，說了一段將無數次被引用的話：「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幾週後，周恩來在一次報告中談到「適當的民主集中制」時，居然用了與毛同樣的排比方式，但把群體與個體關係的次序顛倒了過來：「我們的制度就要有恰當的民主集中制，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又有自由，又有紀律，又有個性的發展，又有統一性，政治制度就會適合這一條。」我讀到周的這段話後的感覺，豈是一句「心靈的震動」可以表達！毛把「集中」、「紀律」、「統一意志」放在第一位，但周卻把「民主」、「自由」、「個性的發展」放到了前面。這裏所透露的，難道不是周心目中對個體與群體／國家關係中孰先孰後的真實看法嗎？所以，我更有理由相信，周恩來從來就不是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

1957年9、10月，在中共中央擴大的八屆三中全會上，毛正式否定了八大決議關於主要矛盾的提法，他經深思熟慮後提出：「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毫無疑問，這是當前我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後來的發展看，這是毛的繼續革命得以不斷推進、文革最終得以發生的一個理論上的基本出發點。

在這次全會上，毛澤東開始對周恩來的「反冒進」發難，說在1956年「來了一個右傾」。進入1958年後，毛又進一步對「反冒進」全面開火。最令毛警覺的有兩點：第一，周在1956年4月的政治局會議後當着他的面說過，「作為總理，我從良心上不允許我不反冒進」；第二，周「反冒進」的意見居然在中共領導層獲得了廣泛呼應。從周恩來的「反冒進」到毛澤東的「反『反冒進』」，成了毛對周的一場大攤牌。毛火力全開，甚至指責周「離右派只有五十米」了。這也是毛對自己的權力和權威的一次大測試。結果，其他中共領導人居然無人站在周恩來一邊，而是都順着毛的路子批判「反冒進」。面對毛和中國領導層眾口一詞的批判，周全然無法為自己辯護，只能一再就自己的「反冒進」錯誤作上綱上線的檢查。

我當時寫到這裏時有一種真切的感受：周恩來絞盡腦汁地試圖寫出能讓他「過關」的檢查，是他人生中一個內心極為痛苦並激烈衝突的時刻。他的常識應告訴他，毛正要做的一切——尤其是那場毛宣佈將要到來的

「更大的冒進」——會給中國經濟及中國人的生活帶來巨大的負面影響。但他卻不能說出這些想法（即使說出來了，在中共領導人中也將是孤掌難鳴），反而不得不給自己扣上一堆帽子，反覆檢討。這是周恩來的悲劇，也是中國革命時代的悲劇！

九

1958年是大躍進的一年，也是周、毛關係發生重大變化的一年。上半年，周恩來因「反冒進」而受到毛的嚴厲批判。毛在中央會議上宣佈：「冒進是馬克思主義的，反冒進是反馬克思主義。」之後不久，大躍進的狂潮開始席捲全國。接着，周、毛關係的發展也以周恩來開始對毛採取「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態度為標誌，進入了從1958年「大躍進」興起到1971年「林彪事件」發生的第四階段。

這裏，「只可順守、不可逆取」這八個字，是周恩來1960年代初通過「中間渠道」給當時在台灣任副總統的陳誠遞送信息時給陳的一個忠告：面對已經年邁的蔣介石，陳不可陷入與蔣的衝突，而應取「只可順守、不可逆取」的態度，等待到「蔣之後」再攤牌。中央文獻研究室一位研究員告訴我，當他們在中央檔案館提供的文件中看到周給陳誠的這句「忠告」時，拍案叫絕，都覺得這其實也反映出了周關於自己如何與毛共事相處的想法。在我看來，這裏的所謂「順守」，就是與毛共事時不要去觸碰毛的「逆鱗」，但又要守住「底線」，絕不能讓中國這艘大船觸礁沉沒。所以，才会有周在文革前夕從毛的講話概括提出「抓革命、促生產」和「備戰、備荒、為人民」之類的「最高指示」。他看準的一條，就是毛固然要把中國搞得大亂，但並不想把由他為「偉大舵手」的中國這條大船搞到觸礁沉沒的地步。所謂「逆取」，我想到的是，這又一次透露出周從來就沒有成為內化的毛主義者；即便在他表現出對毛的思想、戰略和路線的全面服膺時，仍保留着自己有所「守」亦有所「取」、「守」是為「取」服務的信念。在文革的大亂中，他好幾次在內外講話中說，「不會一直這樣下去的」，恐怕就是這種信念的體現。

大躍進伊始，毛在周恩來的頭上擺了五個中央領導小組，大大削減了他的實權。隨後，又要他擔任鋼鐵生產領導小組組長，讓他也「上了船」，

但他是管事的，不是決策的。周在為大躍進「唱頌歌」、又拼命抓完成「大煉鋼鐵」指標的同時，並沒有放棄他的一些基本信念。我在河北省檔案館的解密文件中看到，1959年5月在河北視察時，他居然在「大躍進」的一片喧囂聲中提出，要給農民六項小自由；還說，要「有個人嘛，沒有個人那有集體呢？」我讀到這段話時，有一種石破天驚的感覺。我覺得，這對於分析周恩來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是特別能說明問題的。

大躍進的狂潮席卷全國後，闖了大禍，導致了大饑荒這一人類歷史上和平時期罕見的大災難、大悲劇。這期間，毛澤東退居二線，讓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頂在「一線」，處理各種棘手問題。但實際上，毛並沒有真退，有兩個權力他從來沒有放手，一是軍權，二是主流政治話語的界定權。當時，雖然劉少奇提出，這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果，但包括劉、周、鄧在內的其他中共領導人卻沒有正面向毛的權力和權威、更沒有從根子上向毛的「繼續革命」的理念和實踐提出挑戰。一旦中國受到大饑荒重創的經濟和社會因劉、周、鄧等推行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政策而逐漸恢復時，毛實際上又輕易地回到一線，更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吶喊，準備反攻倒算。

我寫這段歷史時，一個不斷出現的問題是：在經歷了大躍進、大饑荒那樣的空前災難後，毛何以能夠在短短幾年內又積聚起空前的社會力量的支持和參與，發動文革，甚至敢於發出「全國全面內戰」這樣近乎歇斯底里的吶喊？黨政組織系統的控制、對於信息流動的阻斷、對於宣傳機器的全面掌控等等，當然都是重要的原因，但是否還有其他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我的看法是，這裏的一個關鍵之處恐怕還在於，毛的那一套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為中心的關於「新中國」合法性的大敘事，還沒有失去普通中國人的「內在支持」；周、劉、鄧等其他中共領導人對毛的服膺，也絕不僅僅只是對毛的威權在組織上的服膺，也是對毛的思想、毛關於革命和「繼續革命」的大敘事，以及同這一切相連接的戰略和政策的服膺。而他們在革命大敘事的構建上，卻提不出可以與毛分庭抗禮的替代性方案。

就在這種背景下，毛的「後革命焦慮」又發展為一種更為強烈的「晚年焦慮」或「身後焦慮」。自1960年代初起，他多次提到自己要「去見馬克思」了，這其實是他的「晚年焦慮」及「身後焦慮」的活生生的表露。毛回到一

線後親自出馬，把國內的「防修」和國際上的「反修」聯繫起來，伴之以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侵害中國的大聲聲討，以及把大躍進失敗和大饑荒發生的責任歸於蘇聯對中國「逼債」。他在以此封住黨內其他領導人的口的同時，又展開了另一輪超常群眾動員，從開展「四清」，到推進「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一直到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文革開始後，毛給周恩來安了兩個重要的差事：一是中央文革碰頭會召集人，二是中央專案辦公室負責人。這都是周不想幹也要幹的（卻又沒有真正的實權），但他仍做出了「順守」的選擇，並像「橡皮圖章」般不得不為一些最重大的迫害案子簽字背書。但這也讓周遇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幾乎無解的挑戰：他面臨的是一連串的「道德陷阱」，以及與這些陷阱相伴而來的「道德悖論」。他必須不斷地逼迫自己在良知、理性和嚴酷現實的壓迫之間作出極為困難、即便以他極高的政治智慧和協調能力也無法保持「完璧無瑕」的選擇。如何看待周身上與此相關的種種道德瑕疵？這是周恩來評價中最富挑戰性的問題，也是最受到周的批判者詬病的污點。其實，毛對此倒是看得最清楚，並一直在這方面給周「挖坑」。

但有一點我必須指出，在周涉及的所有文革「大案」中，沒有哪一樁可能因他取反對態度而改變。所有案例的結論（不管有無周的參與）都是根據「有罪推定」而由毛和那批「毛派」事先做出的；周反對與否，不會改變受害人的遭遇和命運，卻意味着他站到了毛的對立面，甚至是公然觸碰毛的「虎鬚」和「逆鱗」。這將是他在政治上的自殺，並將失去他手中多少仍能對破壞性的文革進程起到牽制或鉗制作用的那點「權力」。在這裏，在政治盤算和道德衡量之間，不存在妥協的空間和餘地。（由此又聯想到道德批判和歷史批判之間的關係問題。道德批判無疑是歷史批判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道德批判是極為困難的——因為它要面對遠非單純的道德批判所能涵蓋的歷史複雜性；但道德批判卻又可以是極為「簡單」的——如果它在建立自身出發點時「偷懶」，把關於歷史複雜性的思考排除在外。）

1966年底，毛澤東在他的73歲生日聚餐和幾天後的中央碰頭會議上，明確地把文革稱為「全國全面內戰」。這之後，由上海「一月革命」打先鋒，向「黨內走資派」奪權的烽煙向全國蔓延開去，「天下大亂」的局面真的出現了。然而，毛澤東一旦放出了群眾運動的「魔獸」，即使以他貌似

絕對的權威和近乎無限的權力，卻做不到完全控制群眾運動的發展軌跡。他呼喚「全國全面內戰」的到來，但一旦「全面內戰」真的成為現實時，他想要踩剎車，而「全面內戰」卻像失控的大車，根本不聽他的使喚。1967年7月，毛澤東親臨群眾中的兩大派嚴重對立、武鬥不斷升級的武漢，想親自創造一個由他登高一呼、天下歸心、群眾的「派性」鬥爭也偃旗息鼓的例子，不料卻差一點遭到「不明真相」的群眾的衝擊，他自己也在周恩來的緊急安排下，從武漢附近的一個軍用機場乘飛機落荒而逃。在武漢事件的巨大衝擊下，毛對群眾運動的看法和態度變了。1968年7月，毛澤東親自派遣工宣隊、軍宣隊進駐接管派性肆虐、武鬥不斷的清華和北大。從這一刻起，在文革曾風行一時的各地紅衛兵組織土崩瓦解或名存實亡，紅衛兵運動也就此壽終正寢。

歷史真是弔詭。我在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說到底，文革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毛澤東和「體制」的徹底對立或分道揚鑣。不管毛澤東對當時的體制多麼不滿，歸根結柢，他仍然是這個體制最重要的創造者，也是最主要的「得益者」。因此，在一個非常基本的層面，他同體制有着「合為一體」的關係。在這一意義上，即使他擁有似乎無限的權力，他仍然是體制的「最後的囚徒」。從這樣的角度看問題，他在1967年夏末秋初對文革中「造反有理」、「全面內戰」態度的上述「轉向」就毫不奇怪了。回頭看，其實周恩來正是「體制」的人格化存在，而他的「逆取」其實也正是建立在他自己對這一點的清醒認識上的。

1969年，九大這個「團結的、勝利的大會」召開後，本來應當走向終結的文革卻始終終結不了。毛澤東和他的接班人林彪之間矛盾的出現只是表象，問題的真正癥結在於，林彪不要再「搞革命」而是要轉向建設了，而毛卻認為「革命還沒有完」。然而，比毛的意志和權力更強大的，是歷史本身發展的力量。

十

在中共革命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也許沒有哪件事比1971年9月發生的林彪事件更富戲劇性、更具爆炸性了。林彪攜妻兒倉惶出逃，

在蒙古溫都爾汗墜機身亡，這一事件完全出乎毛澤東、周恩來的意料。本來，文革走到這一步，毛的「繼續革命」的思想和實踐早已引起了人們普遍的懷疑和不滿，林彪是毛欽定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卻以這種幾近天方夜譚的方式死去，幾乎在所有人（我想，也一定包括周恩來）的心目中摧毀了毛一貫正確的神話，對毛和毛的「繼續革命」大業的衝擊是致命的。直到1976年周、毛相繼逝世，他們之間的關係進入了與先前全然不同的新階段。

即使周恩來從來就不是一個內化的毛主義者，但直至林彪事件發生，他仍保持着對毛的「繼續革命」理念與實踐的某種服膺和遵從。他的行為也表現出一種「雙重關懷」的特徵：既唯領袖馬首是瞻，也以「為人民服務」為目標。林彪之死給周恩來帶來的複雜感受中，有一種應為「兔死狐悲」（這尤其是因為，他和林彪在革命和建設之間關係上理念相近）。但我覺得更要緊的是，它抹去了周內心深處對毛主義（尤其是對毛的「繼續革命」的理論和實踐）還殘存的最後一點敬畏和信奉，成為他對毛和毛主義基本態度的一個決定性的轉折點。毛的陰影依然存在，但周對毛——也包括對江青、張春橋等「毛派」——的態度變了。

就在林彪事件發生幾乎同時，從乒乓外交到基辛格、尼克松先後訪華，中美關係解凍。從表面上看，這裏的動因可以歸於中蘇之間反目為仇後成為死敵。但我覺得，幾乎所有的現有討論都忽略的一點是：隨着文革走下坡路、中美緩和的發生，毛澤東和中共領導層以「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為中心意象的新中國合法性敘述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自1968年蘇聯入侵捷克後，毛和中共給「蘇修」扣上「社會帝國主義」的大帽子，到與林彪事件幾乎同時發生的中美關係解凍，構成「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這一合法性宣示的兩套內在話語（一套強調共產主義的烏托邦想像，另一套則強調中國的崛起與富強）出現了此消彼長的情況。其重心越來越從毛的烏托邦想像游離開去，朝着革命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靠攏。

也在幾乎同時，在周恩來主持下並獲得毛澤東批准，從西方國家進口總值達43億美元的成套設備和技術的「四三計劃」提出並付諸實行。從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和效應來看，這是中國進入西方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市場」的重要一步。它同後來的「改革開放」不可同日而語，但卻又是「改

革開放」於1970年代後期起步的一個重要前奏。還有一點也極重要，與上述相關：「新中國」的「國際身分」從現存國際體系體制（這仍然由美國及西方資本主義國際佔據主導地位）的「局外人」和挑戰者開始朝着「局內人」轉變。

周恩來作為中美關係解凍最重要的中方操盤人，在國際上聲譽大增。同時，林彪事件後，周恩來又在毛澤東未表態的情況下，竭力主張要批評林彪的「極左」。這直接觸動了毛「身後焦慮」的敏感神經，引起毛的警覺。1973年11月，周恩來遇到了他自「反冒進」以來最大的政治生涯危機。毛以周在同基辛格的會談中「犯了嚴重錯誤」為由，給他扣上「右傾、賣國」的帽子，指令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對他進行持續近三週的嚴厲批判。對此，周恩來卻一反常態，採取了他先前從未有過的「軟對抗」態度。自延安整風起，「多做工作、經常檢討」就是周恩來對自己以及在自己手下工作的人們反覆強調的一個基本要求。然而，這次他卻一反遵循了幾十年的這條「規則」，在會上要麼保持沉默，要麼說自己只是「做得不夠」，絕不肯按照「右傾、賣國」的口徑往自己身上潑髒水。

當時，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鄧小平已回到政壇，並按照毛的指示列席了批周會議。他發言時沒有批周「喪權辱國」，而是抓住周對毛的態度，說周的問題癥結是：「你現在的位置離主席只有一步之遙。我們在座的所有人都認為，我們對毛主席是可學而不可及的；你內心卻認為，毛主席不只是可學的，而且是可及的。」鄧的發言抓準的，正是毛的「身後焦慮」這個要害，但又不至於會打倒周。在這一點上，周和鄧「心有靈犀一點通」，立即照這個路子做了檢討。毛的眼睛一直盯着鄧，鄧發言後也通過了毛的考察；這之後，毛在一夜之間叫停了這個批周會議。

毛澤東搞的這場「批周」風潮聲勢很猛，卻落得這樣一種有始無終的結局，從中折射出來的不僅是毛、周關係的改變，也涉及到毛與和周所代表的「建制力量」之間的關係。文革中，毛打倒這個、打倒那個，到頭來卻還是沒有鬥過建制力量。而被打倒的那些人，也一個個地被「解放」了出來，周恩來也成為毛既要打，卻又不能打倒、也打不倒的存在。毛澤東即使再有「虎氣」，但以周為代表的建制力量卻像另一隻如來佛的手掌心，是他這個「猴子」無論怎麼折騰也跳不出去的。這是否意味著，即便是毛

澤東也成了他自己創造的革命的「最後的囚徒」？

在周恩來生命的最後幾年，他身患絕症，毛澤東也是——他們兩人是幾乎同時被確診患有不治之症的，並都只有兩年左右的生命預期了。我寫他們這兩年的經歷時，有一種感覺：他們之間發生了一場「誰能夠活過誰」的悄無聲息、心照不宣的生命與生存競爭。周在政治上的縝密心思，幾乎全都用到為「毛之後」的到來做準備上了。對毛，他仍然堅持採取「順守」之法，而絕不做「逆取」之事。他身患重病後，毛對他的檢查和治療態度曖昧，他絕不正面對抗，甚至兩度寫信給毛，以極為卑微的語氣向毛表示，他願意在有生之年寫出一篇對自己歷史上所犯錯誤的「像樣的總結」（當我讀到這些文字時，心中不由得想到，周這麼做針對的正是毛的「身後焦慮」）。但同時，周又敏銳地抓住了毛晚年內心的矛盾和變化，一方面全力支持鄧小平的整頓，並把江青、張春橋「有嚴重歷史問題」的把柄交到鄧手裏，直接影響了鄧對江、張（也包括對毛）的態度，以自己的「鋼鐵工廠」來對付四人幫的「帽子工廠」。另一方面，周又在與毛的最後一次長談中，當面向毛報告，據康生說，江青和張春橋有「嚴重政治歷史問題」（周和康生都是主管情報工作的，這個話，只有周能對毛講）。這一着，決定性地影響了毛對「身後政治佈局」的考慮。周逝世一個月後，毛雖然把鄧小平又打了下去，卻沒有讓一心謀求總理位置的張春橋、而是讓「你辦事、我放心」的華國鋒接任總理。由此看來，周恩來在文革中所起的作用，絕不僅僅是「鉗制」了文革的災難性影響，更重要的是（尤其是到了他們的晚年）他通過「注意鬥爭方式」，沒有「讓大權落到他們（四人幫）手裏」。這一切，恐怕改變了毛之後中國的命運。

十一

我在這些年寫周恩來傳的過程中，感覺他的真實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變得清晰起來。他是一個複雜的人物，但不是一個「謎」。他的人生和政治生涯，確實被籠罩在毛澤東的思想、權力和權威的巨大陰影之下，但我從研讀文獻資料中看到，即便如此，他內心深處仍保留着自己的信念、看法和行事理性。

我還會不斷地問自己一個問題：在毛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的洶湧大潮中，尤其是在天下大亂的文革歲月裏，對中國和普通中國人來說，究竟是有一個周恩來好，還是沒有一個周恩來好？我對他的研究越是深入就越是感到，在毛時代的歷史條件下，中國政治舞台中心有沒有一個周恩來是不一樣的，他的作用也是不可替代的。當毛的「繼續革命」在「破字當頭」指引下，不斷將中國的國家、社會以及普通中國人的生活帶入困境乃至像大饑荒和文革那樣的大災難時，他雖不可能阻止這種行動，卻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手中的那點權力，取「順守」之法，盡可能地牽制或限制毛肆意妄為的大動作帶來的惡果。當一切走向瘋狂時，在中國權力中心有一個仍能保持理智和理性的周恩來，就顯得尤為重要。

周恩來並非如官史所稱道的那樣是「道德聖人」。在中國革命時代，他和毛共事幾達半個世紀，怎能沒有道德瑕疵和道德污點？這首先是因為，中國共產黨革命涉及的一切悖論中，最根本的是道德悖論。始於烏托邦空想的革命是一個巨大的「道德陷阱」。它將「善」的想像和追求在實踐中推到極致，但同時這也為「惡」乃至「大惡」以「善」的名義泛濫打開了通道。我覺得，周恩來的故事告訴我們：革命，尤其是勝利了的革命，似乎是治療社會頑疾的一服猛藥，它會帶來巨大的效應，但也會產生巨大的副作用，並會留下各種後遺症。它觸及不到的，是同各種頑症聯繫在一起的人性的弱點（尤其是人的可墮失性）。甚至，革命的猛藥本身也往往是「以毒攻毒」，會張揚乃至無限放大人性的弱點——當革命的勝利讓革命者獲得巨大的、不受制約的權力時，更是如此。結果，治標不治本，到頭來似乎得不償失——頑疾依然存在，只不過變了模樣而已。要想從頭開始，卻做不到了。再搞革命？再來一服猛藥？以「革命」來「告別革命」，其實只是讓「革命」延續乃至得到永生。

隨着 20 世紀的逝去，「革命」、尤其是左翼激進革命的負面記錄大量湧現，其理念和實踐在人們的反覆檢視及嚴厲批判之下也不斷地被「妖魔化」。這同無數生活在革命時代的人們的慘痛經歷和經驗是分不開的，因而絕對是有道理的。然而，若因此便給革命「蓋棺論定」，不再做追根尋底的進一步探究，卻是對革命的不公，是對千千萬萬曾參與革命、乃至為革命獻身的生命的不公，也是對歷史的不公。我們若要徹底地「告別革命」，

最需要追問的是，革命何以會發生「異化」、走上岔道和自身初衷的反面。

這裏可講的道理千頭萬緒，說到底，恐怕可以歸結為兩點。第一，以「人的解放」為初衷的「改天換地的革命」卻走上人的壓迫和人性泯滅的歧路，同它所面臨的一個幾乎無解的悖論分不開。以毛澤東的革命和「繼續革命」為例，它面臨的最大挑戰是：革命如何改造「人」？這涉及到如何消滅「舊人」，以及如何想像並創造「新人」。在現實生活中，「新」「舊」之間卻沒有可以明確劃分的界限，相互之間也沒有不能逾越的鴻溝。在毛時代、尤其是文革期間，今日座上賓、明日階下囚的現象比比皆是。所謂「新人」與「舊人」之間的身分轉換或重新認定，真是容易得很。然而，「新人」本不存在，從無到有，卻仍需由「舊人」來創造。於是，這又引出了極具諷刺意味的現實：儘管毛的「繼續革命」以挑戰並摧毀「舊文化」為目標，但在設定革命的方法和手段時，卻從未能超越「舊文化」的制約與影響。到頭來，以人的「解放」名義而推動的革命卻帶來了最殘酷的人的壓迫。毛和他的同志們認為，他們正在書寫的是一段將結束一切「歷史」的歷史；但他們本身，卻仍是他們希望終結的歷史的產物。

第二，問題還出在革命所創造的巨大的、再無任何制約與制衡的政治權力。一般來說，比之其他導致政治權力轉換的過程，勝利的革命更容易產生一種缺乏制衡、對於勝利的革命者也缺乏制度約束的政治權力。在中國共產黨革命中，由於「中國出了個毛澤東」，問題變得更加尖銳。毛的革命和「革命後的革命」，將除了他本人以外的所有人都變成革命的對象，試圖以革命的名義，創造出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從未有過的「王聖合一」的權力結構。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化。以「革命」的名義行使的絕對的權力，又打着「革心」的道德革命的大旗，則有本事使腐化深入到人的心靈深處，乃至人的靈魂。

若從這樣的視角看問題，我們是否還應想到：對「革命」的批判中還有一個涉及到每一個曾生活在「革命時代」的人的層面。毛澤東、周恩來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首先都是中國歷史、文化以及他們所處時代的產物，每一個經歷過中國革命時代的人實際上也是。在後革命時代，尤其是在歷史又處在巨大轉折關頭的今天，當我們試圖反思、批判和超越中國革命時代時，我們是否應當清醒地意識到：我們自己，即便曾是革命的受害者，

其實也是「革命時代」的某種產物。我們所使用的批判武器及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仍是催生了毛、中國革命時代的那些同樣的東西。既然如此，當我們批判革命時是否能切記不要重蹈革命的覆轍？我們是否能認識到，不管我們自以為所追求的價值或目標多麼崇高，其實沒有什麼可以使我們獲得不被權力和周遭環境所侵蝕的「免疫力」。而革命批判本身，恰恰可能會使我們陶醉於一種自我崇高的想像之中，使我們自以為或者具有這種免疫力，或者對這個命題不屑一顧。我們恐怕應認識到，不管我們多麼努力，也做不到徹底「告別革命」。這裏的一個原因是，我們每個人心中的某一角落，可能仍隱藏着某種導致革命發生的「基因」。說到底，既然我們是革命時代的「產兒」，那麼在某種意義上，我們也不可避免地仍會是革命的囚徒。

今天，中國的革命時代已成過去，然而它巨大的正面與負面的遺產卻遠遠沒有獲得徹底清理。周恩來的故事——乃至20世紀中國「革命時代」的歷史——給人們留下的最大教訓之一，應當是「摧毀」比之「建設」可以遠為淋漓盡致，也遠為容易。尤其是毛統治下中國共產黨革命所遵循的「不破不立」的政治哲學，更使得革命的進程在「破」的領域可謂摧枯拉朽，但在「立」的範疇卻是舉步維艱。然而，「破」字當頭，「立」字並不一定就在其中。而被破了的東西要重新立起來，卻遠不是那麼容易的。不知讀者是否能把上述看法作為讀這本傳記時的參照？

確定周恩來最終的歷史定位，從來就不是我寫這本傳記時為自己定下的目標。在學術層面，我看到的是周恩來已成為如此具有爭議的人物，因此，我從不奢望我所講述的周恩來故事會不引來各方的批評、非議乃至否定。我講述的這個故事，只是我的「一家之言」。更何況，周恩來的故事是仍在演進中的中國「漫長的崛起」過程的一部分。「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個故事會怎樣被人們在未來講述，不僅將取決於檔案文獻和其他史料的解密及使用，也將取決於周恩來所留下遺產中的哪部分會被那時的人們銘記和發散。寫到這裏，不由想起了流傳世間的周恩來故事中最有名的一段。在1970年代初的一次會晤中，基辛格詢問周恩來對法國大革命的看法，周的回答是：“It is too early to tell”（現在下結論還為時過早）。